

学术文化生态的构建探析

——基于学术“腐败门”的文化困境

李石勇,马卫华

(华南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处,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文章从常规监管缺位、制度执行不力、学术风气败坏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学术腐败的文化困境。提出要改变当前学术腐败局面,需从学术文化层面着手,构建一种以德性文化和制度文化为核心的学术文化,建构这种学术文化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加大对学术腐败的惩处力度;要建设稳定、公平、公正的学术秩序;要大力弘扬学术自主的精神。

关键词:学术文化;生态构建;制度文化;德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C01/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131-04

近些年,学术腐败似乎越演越烈。稍远点,有院士指认自己的弟子造假、长江学者抄袭;稍近,则有《刮宫术后宫腔粘连185例分析》遭到16个单位25人6轮抄袭,荣登“史上最牛论文抄袭”;《读书》期刊前主编、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汪晖陷入“抄袭门”事件等等。本文想讨论的是,为什么起着呵护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竟然也前仆后继、腐败不止,沦为了了一颗腐败黑心?《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①这个故事说的是,一种事物,不论其好坏,其出现都需要一定的环境。本文运用此故事所讲的常识性道理来思考学术生态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文化生态?

一、学术“腐败门”的文化困境

把学术圈这一桩桩抄袭事件称之为“腐败门”,可能有人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但从腐败的最广泛意义而言,一种为了个人私利而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应该称之为腐败,不能说,只有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才是腐败。学术抄袭事件的频频登场所反映的学术腐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进言之,学术抄袭事件表现了中国腐败正在向纵深发展,从官场蔓延及学界。可以说,学术“腐败门”和近来中国煤矿领域、食品药品领域、建筑工程领域等所暴露出的恶性腐败事件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细看目前对学术“腐败门”的诊断与分析,无非三种基本的路径:其一,常规监管缺位。如由于缺乏认定腐败的公共机构,这降低了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目前,很多东窗事发的案例不是由于内部利益争斗而被揭发,就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被暴露,鲜有监管机构按照常规程序与手段检查出学术腐败。所以,目前那些揭露学术腐败的人,不是要将学术腐败作为腐败来反,而是要将学术腐败作为工具来利用。当然,只要这些揭露者并非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就是允许的,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把反学术腐败的主要责任寄托于这些偶然因素上,那学术腐败永无被遏制之日。从目前学术腐败暴露的形式看,学术监管机构几乎是缺失的。那么,哪些是学术监管机构呢?各大学的科研管理部门、学术刊物的编辑部等,这些机构都有责任。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这些机构,因为毕竟没有专职的反学术腐败机构。其

^① 本文所引中国古籍,皆出自中华书局版本,以下只注明篇名。

二,制度执行的不力。目前,学术腐败中的问题还主要不是能否发现的问题,而是发现问题后的查处力度问题。即使发现了学术腐败事件,各高校或相关利益团体也出于本单位的声誉等利益的考虑,采取低调行政处理,腐败分子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大大降低了腐败的代价等。按照经济学的分析,经济人的本性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其任何行为都可以按照成本、收益的公式展开分析,如果惩罚度与查处率都很小,只要有腐败机会,腐败的可能性就很大。这也就是孔子说的“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其三,学术风气的败坏。风气的败坏与制度执行不力密切相关。因为腐败成本较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腐败,学术道德风气自然就变坏了。这突出表现在目前学术界的一系列潜规则上,如以自我为中心,通过师友、地域等构建亲疏关系的利益圈,彼此互相抬举、吹捧,在温情脉脉的情感交往背后,事实上形成了稳定的利益交换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术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已经形成,形成各种派系。学术界通常以有权势的博导为中心,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学术山头”。这种学术山头,一为争实利,尤其是为争夺体制内资源而拉帮结派;二为争名头,以求扬名立万。虽然手头没有详尽的数据,但身处学界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些较好的大学,在选择学生留校时,大多数是那些学术权势人物(这些学术权势人物都是博导)的学生留下来了,然后围绕这些权势人物,形成一个学术集团,甚至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学生吹捧老师,老师抬举学生,相互推波助澜。争利与争名,合在一起,学术山头、学术特殊利益集团,不形成才是怪事。当然,这种习气,非自今天才有,古已有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凡例第十五条曰:“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主,而依草附木者豁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这样,学术论争就很容易沦为一种利益之争,这在最近的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中的挺汪派与倒汪派之间,就有所表现。

概而言之,以上常规监管缺位很容易解决,但制度建构与学术风气之间恶性循环而形成的学术“腐败门”的文化困境却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挑战。要突破当前学术“腐败门”的文化困境,就必须追问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生态,而后才能为中国当前学术腐败走出文化困境提出有效的对策。

二、建构德性文化和制度文化为内核的学术文化

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现在是一个大时代,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时代,而且还有大的发展。这个大时代事实上就是中西交汇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处在中西交汇的时代坐标上,我们必须面向全球,继承和发扬各自优秀的文化成果,方能取得巨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在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生态”这个问题时,也必须有这种开放的心态:一方面,不能闭门造车,盲目崇古,从老祖宗那里寻找现代病的答案;另一方面,也要谨防在大力拥抱西方的同时,让传统的文化糟粕与西方的文化毒素结合起来。具体到对于我们学术生态的建构而言,我们需要继承传统的优良的德性文化,同时吸收西方健康的制度文化,还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又能留给后世的文化。

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对道义追求的德性文化^①,追求的是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君子人格,因此,传统学术生产存在与现代中国学术生产截然相反的怪现象:当今许多学人费尽心机抄袭、剽窃,把他人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而传统学人却绞尽脑汁把自己的成果送给他人,托名流传。这种以德性文化滋养下的传统学术生产,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承载着宏大叙事和崇高神圣的使命和责任,古代士大夫把对学术的追求等同于君子对义的崇尚,视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与使命。正如王符在《潜夫论·赞学》中所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宋代张载认为学术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代有识之士在学术研究身上寄托了“制夷”、强国之梦,并把学习西方的技术、翻译西方著作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寅恪认为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1]。

在继承优良德性学术文化传统时,我们也不能片面夸大德性文化的有效性。因为,现代学术生产已

^① 冯友兰提出了“西方是智性文化,中国是德性文化”的观点,德性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重德,以德摄智的文化。

经被职业化,成为了学人谋生的工具,可以说,学人的升迁荣辱都系于自身的学术生产。我们现代的职称晋升制度、学术奖励制度等等,一方面,带来了数量上繁荣的学术生产,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学人逐步丧失了学术生产的内在动力,学术生产不再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意义,而变成一种纯粹的谋求功利的行为。因此,在这种不讳言功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的学术生态应该在继承优秀德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健康的学术制度文化。具体来说,这种学术制度文化应该包括公开、公正、透明的利益规则体系和“求真”的学术价值。

其一,公正、公开、透明的利益分配体系。这是健康制度文化的基础性内容,它要求我们坚持改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良性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创造经济环境。关于这一点,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从经济学视角给出了精彩的分析,他在分析传统的孝道文化时如是说:“在没有发达法治的农业社会里,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另外,像两千五百年前由孔孟推出的儒家‘孝道’及相关价值体系,即是增加家庭内部隐性交易安全的进一步保证。换句话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他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2]同样,学术领域应该建立一种公开、公正、透明的利益分配体系,一旦通过正当的制度来进行学术利益的分配大行其道,通过师友、金钱关系等潜在的利益分配方式必然会销声匿迹。

其二,弘扬学术自主的“求真”价值。西方有着悠久的求真传统,这和中国的学以明道的传统有着巨大的差异。任鸿隽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吾人所谓道者,虽无界说可凭,而可藉反对之语以得意义之一部分,则道常与功利对举是已。执此以观西方学术,以其沾沾于物质而应用之博广也,则以其学为不出于功利之途亦宜。不知西方科学,固不全属物质;即其物质一部分,其大共唯在致知,其远旨唯在求真,初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是故自彼之真以道,则彼邦物质之学,亦明道之学。”^[3]西方的这种求真传统内在是一种力图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去解释世界的精神,而正是在这种对世界的不断追问、探究中获得自身的内在价值。古希腊哲人对世界本源的追问,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不懈追求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即便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哲学仍然保持一种用理论去解释世界、探索存在的本真精神。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发展,哲学的探究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了认识论、语言学的两次重大转向,哲学成为与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一个学术门类。但总的而言,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科学特点,即“那种成系统的知识总体正因为成系统,就已经可以叫做科学(wissenschaft)了,但如果把知识联结在这一系统中的是某种因果关系,那么它甚至可以称为理智的科学”。^[4]通过系统的逻辑论证,重视对世界进行理论解释、认知的求真精神,在西方近代学术专业化的背景下,倡导了一种学术与政治分离,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神。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使得西方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避免了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5]

三、学术文化更新的对策性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力度

在实践中是否能严格执行法律,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重要考量。对于学术产品而言,要确认它不合格或来自于抄袭剽窃,本来就比较难。如果认定了某学者抄袭,却不予以严厉查处,则绝不足以举直措枉,反而助长了人们的侥幸心理,极大地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论语·为政》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如果发现了学术腐败却不严厉查处,则腐败者大量获利,腐败收益远大于腐败成本,则其他人难免群起而效法之,是故,必将导致“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教育部部长周济要求:“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6]

目前,我们一方面急需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学术立法,完善自身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我们更需要严厉打击学术界通过拉人情、走关系等一些隐性利益交换的行为。如果这些学术潜规则得不到遏制,那么,我们一套公正的学术法律法规就会被蛀蚀一空,形同虚设,最终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当

然,要突破这种学术潜规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毕竟,以儒家为传统的乡土中国生长了两千多年,人情礼仪的隐性利益交往深入了骨髓。我们除了采取曝光、透明化的阳光制度外,更为重要的是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

(二) 尊重学术规律,建设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

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

建设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需要建立健全的学术制度,确保学术研究能在经济上获得完全独立。同时,从法律上规定学术的责任与自由,划定学术探讨的边界,确保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国外在制度建设方面就有很成熟的经验。如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成立,学术自由在美国获得了制度化。同时,该协会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 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 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 Academic Neutrality)中的学术中立原则也明确表明了学术的责任,这样,“大学的校长和院长犹如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行走,它深受两侧的挤压。一侧是学术自由原则,另一侧是研究经费的主要供给者、公共利益和安全的最终捍卫者——政府赋予的至高无上的责任”^[7]。正是自由与责任的制度化保障,最终才确保了学术的自主性,维护了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

(三) 重塑优良学术传统,弘扬学术自主的精神

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正义·乾·九三爻·文言》)荀子则说:“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之父鼐特先生说:“学术的基本原则(追寻真理或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客观性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8]中西论述脉络殊异,但都非常强调对学术之德的要求。具体来说,中国为学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强调为己的君子之学,因此,“中国传统,重视其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而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8]而西方求真爱智慧的传统,为学自古强调以学为中心,强调去探索宇宙客观的真理。但不管怎样,中西为学之德最根本的要求乃是一种学术自由探索的精神,正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9]

因此,我们在继承优良德性学术传统的同时,需要以一种学术独立的自觉意识,摒弃传统中“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实用主义倾向,审慎处理好“学”与“政”的关系,避免“学”沦为“政”的附庸,丧失了其独立的价值;同时,我们还需要避免传统为学盲目比附圣贤、六经的现象,失去独立的思考。对此,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论理学之附属品。”^[10]总之,重塑传统需要我们摆脱对政治的附庸,摆脱对圣贤、经典的比附,树立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提升学术研究的思考独立性,弘扬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M]// 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18.
- [2] 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216.
- [3] 任鸿隽. 论学[J]. 科学,第2卷第2期,1916年5月.
- [4] 康德.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邓晓芒,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2-3.
- [5] 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冯克利,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5:34-37.
- [6] 周济:标本兼治 惩防并举 全面推进高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3/16/content_11017677.htm,2009-03-15.
- [7]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M]. 徐小洲,陈军,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7.
- [8] 林毓生. 论旺晖事件——清华应负起政治与道德责任[N]. 南方都市报,2010-06-09.
- [9] 钱穆. 中国学术通义[M]. 台北:学生书局,1975:167.
- [10]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89.